



【海上评弹】 跟着政府走，向政府要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

开发商差点摔茶杯

周俊生

沈阳市政府半个月前刚刚公布了“政府南迁”的消息，日前却又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市委市政府从未正式在权威媒体平台发布过“政府南迁”的消息。在市府迁址问题上，沈阳市政府态度的迅速变化，大大出乎公众意料，并让沈阳当地的开发商气急败坏。

2010年2月，沈阳宣布开发“大泽南”，同年8月，规划建设方案出台，沈阳市行政中心也将南迁至此。如今，行政中心已经建成，据说非常豪华，这个地区也成为当地开发商趋之若鹜的“宝地”。按照开发商在十几年来的房地产市场上摸爬滚打积累下来的经验，政府行政中心的周围，一定能够形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热潮，行政中心的标准那么高，旁边的商品房也将有相应的高等级，卖出大价钱。目前，这个崭新的行政中心已经建成，但是，就在这个让开发商兴高采烈的时刻，沈阳却改变了几年前的规划，放弃了“政府南迁”的计划。

沈阳市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答案不难寻找。在中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管理的背景下，沈阳市行政中心如果搬进那么豪华的新建办公楼，无异于是“顶风作案”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沈阳的“父母官”在老房子里继续为人民服务，虽然委屈了一点，但至少不会成为违反中央规定的一个“坏典型”了。

但这样一来，却让那些当年投入

了巨大热情的开发商产生了危机，他们此前押宝“政府迁址”概念而投下的巨资面临着收不回来的可能。如今，这个已经成形的新区空空荡荡，形似“鬼城”，豪华的楼盘无人问津。这自然急坏了开发商，他们对政府违背承诺十分气愤，据说就在最近一次沈阳的市长办公会议上，一位开发商老板激动之下，差一点就要把放在他面前的茶杯摔到地上。

开发商的茶杯终究没摔出去，估计真的摔了出去，尽管市长很没面子，但市长的肚子虽然比不得宰相，撑个小船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因此估计开发商不至于会被市长赶出会场。倒是对于这位开发商来说，需要作些反思。将市场开发的目标紧跟在政府屁股后面，他可能收获从政府那里流出的丰

硕红利，但也需要承担政府规划改变的后果。沈阳的权力中枢忽然收回“政府南迁”的成命，这固然有点不堪，但如果开发商只是围绕着政府规划开发高档楼盘，而不是把房地产开发的目标定位在普通市民那里，这样的市场又能行多远？

但是，我们说开发商的风凉话是容易的，而他们之所以会在市场定位上出现这种令其始料未及的错误，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得从政府身上找。当政府牢牢地掌控着市场资源的时候，跟着政府走总是意味着能够收获最丰富的市场红利，这远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拼抢容易得多了。正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使开发商形成了跟着政府走的思维定势。

其实，又何必是这位恨不得要摔茶杯的开发商，跟着政府走，向政府要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今天，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模式的问题，希望通过收缩行政审批权力来释放市场活力。但是，当政府这样做的时候，市场本身是否能够适应却还是一个问号。前不久，当河北保定将成为所谓“副中心”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时候，市场上顿时“人声鼎沸”，出现了所谓“保定概念股”的炒作热潮。虽然这一场炒作如今已经“人去楼空”，然而它留给我们的启发却是意味深长的。当政府对经济运行仍然拥有说一不二的至上权力的时候，那么，市场除了围绕着政府转，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呢？

(作者系上海媒体人士)



【贾语村言】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的回报份额开始提升，资本和土地的回报需要相应地回落。

取消限购又如何

贾仕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评价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王妃玛丽·安托瓦内特说过，“她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句著名的话曾被无数次引用，用来规劝世人凡事不可过于骄纵。香港警匪片《无间道》里也有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意思相近，但表意更加直接。

如果能预知今天这种进退失据的纠结局面，不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当初是否还愿意把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曾经无限风光的房地产市场，如今成了手中的烫手山芋，扔也不是，拿也不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调控房价是政治任务，卖地赚钱是经济任务，当市场走向疲软的时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便陷入了无限的纠

结当中。

地方政府的纠结在是否取消限购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今年以来有多个城市先后试探松绑限购，但在外界压力之下，又相继收回政令。与此前出台限购措施时的威严肃比，取消限购多是悄悄进行。

在房地产的复杂棋局中，房地产商的公众形象比较差劲，但有不少房地产大德在舆论面前振振有词，原因是他们知道，政府离不开自己。不管是愿意承认，房地产的确绑架了经济，地方政府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于土地出让金，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高企，房地产行业对上下游产业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要稳增长，要保就业底线，地方政府对房地产难免有投鼠忌器的心理。

中国经济不可能一直抱着房地产的大腿，况且如今这条大腿已经不

那么粗壮。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一直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倒是有一些经济体栽在了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上。从长远发展来看，让经济支柱尽早实现与房地产脱钩是必由之路。

房价非理性上涨有两个坏处，一是房价越来越脱离普通百姓的购买能力，造成民怨沸腾；二是泡沫一旦破裂，将会严重拖累金融体系，危害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调控房地产市场应该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但是要想把房价调控到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民的基本居住权利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房地产调控更重要的任务是防止泡沫继续吹大甚至破裂，避免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

房地产商当然是一直反对限购政策的，理由除了台面下的利益，还有台

面上的交易自由原则。非常时期，宏观调控不能让位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必要的行政干预当然很有必要，限购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举措，但是，当推动房价上涨的原始动力逐渐消失，市场供求关系开始逆转的时候，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一刀切的行政干预措施，值得仔细探讨。

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众说纷纭，如果纠结于细节，则会自说自话的局面，地产商赖政府地卖得贵，政府怪地产商价定得高，自住的指责炒房的扰乱了市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从宏观的角度理解，能获得较多认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主要包括特殊的汇率安排和人口结构因素。一般认为，汇率升值压力如果得不到释放，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将会快速上涨，不动产价格当然会一马当先。丈母娘推高房价说是地产商的发明，

背后反映的人口因素带来的房屋购买力。如今来看，汇率升值压力和人口扩张压力高峰都已经过去，这两个推动房价上涨的动力已不复存在。

古典经济学认为，土地、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创造了经济价值。过去一段时间，三个生产要素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取的回报早涝不均，土地和资本占优，劳动处于明显劣势，土地的优厚报酬的一个表现就是房价持续飞涨。可以看到，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发生明显变化，劳动的回报份额开始提升，资本和土地的回报需要相应地回落，也就是说，房价回落其实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既然房价缺乏持续上涨的基础，继续死守限购政策已无必要，调控的重点应该放到如何防止房地产硬着陆上来。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儒林经济】 僧官们搞经营活动信手拈来，和世俗社会广有交集，乃至经常发生摩擦。

和尚搞出租

王国华

如果有心，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古代的考生、落魄士子、放逐官员在长途跋涉时，多宿于寺庙中。至于皇帝出巡，给寺庙题字、与僧人长谈、在庙中遇到奇人的典故更是不胜枚举。

故事多发之地为什么是寺庙而不是旅店？我分析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原因：其一，古代中国人安土重迁，没有旅游传统，旅店多为倒买倒卖的商人准备，数量少、分布稀。虽有所谓“驿馆”，却是照顾公家人的，具公务员身份才可入住。文化人出外，晓行夜宿，不见得时时遇得上旅店。一村一店、一乡一店是不可能的，一村一店、一乡一店倒不离谱。中国上层建筑中，信仰佛教的不少，建造了大量

寺庙，里面有大量空余的房间。佛门子弟与人为善，为路人提供一点方便，顺便供应几顿饭食，不算意外。其二，古代的考生、落魄士子和放逐官员处境不佳，兜里钱少，能省即省。寺庙不像旅店那样苛刻。有钱呢，就捐点香火钱；没钱呢，也不会逼人太急。

《儒林外史》中，和尚就像超级龙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在最需要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庵是尼姑专用的，和尚住的地方叫做庙或者寺，但《儒林外史》中经常庵庙不分。这应该不是作者的疏忽，只能证明清时代的人们庙庵天天见，见怪不怪，懒得分清这些词汇了。反正都是出家人呆的地方，叫什么叫无所谓。现代字典中，“庵”的释义之一是“简陋的茅草屋”。这点倒很符合当时情境。

乡间的和尚大多不事生产，化缘维生，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所以社会地位并不高，被人呼来喝去好像大众仆人，住的地方也都因陋就简，能省便省，称为庙实在是太牵强，凑合着叫个“庵”吧。

当然这是指一般的和尚，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居住在大城市里的和尚，庙多空房，用于出租，牛得不行。萧金铨、李恬逸、诸葛天中三人在南京商量着租个住处编选一本书，要求房子僻静一些，宽大一些。他们找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张嘴就说这里空房子多的是，各位现任老爷爷常到这里来往。不过禁令勾起了好奇心罢了。不禁了，神秘密也随随之消失，没准儿，你催着他做，他倒反而敬而远之了。

具体到赌博这件事儿上，禁与不禁，还真让人纠结，共同的尺度，颇让人难以把握，因为这种游戏，很能让人上瘾，如果完全不管，估计许多人最终免不了要亲身饰演一下人间悲剧里的什么角色；如果完全禁止，似乎也无

还有一类是僧官，从南北朝开始，历代均设置僧官，负责管理寺庙和僧尼事务，由僧人担任。僧官其实也是和尚之一种。他们搞经营活动信手拈来，和世俗社会广有交集，乃至经常发生摩擦。僧官慧敏把田产出租给佃户，佃户何美之巴结慧敏，将他请到家里吃饭，并让妻子作陪。慧敏吃高兴了，把衣服脱掉，敞怀腆肚。附近农民以“和尚如青天白日调情”为由将慧敏送官，慧敏虽系被人陷害，但一举一动终究不符合僧人规范，其骄横与放纵亦可见一斑。另一居住在南京的僧官也是靠出租房屋挣钱，到任之后还大摆宴席，邀请各类人物到家里喝喜酒。可巧的是，一个叫龙老三的男人装扮成女性前来搅局，自称僧官的太太，大呼小叫，搞得现场一塌糊涂，后来还是

老辣儒生金东崖将其赶走才避免了事态恶化。

这些和尚在饮食方面跟世俗人几乎没什么区别，动辄大鱼大肉，何美之请慧敏吃的是只煮好了的母鸡和半只火腿，另伴美酒，也没见慧敏推辞。郭德纲说过一个相声，说某人到庙里去祭拜，碰到一个老道卖给他一个什么东西，此人回家后发现东西是假的，到寺庙里来讨说法。庙的人回复说，你被骗了，庙里哪里来的老道？是的，老道的办公地点应该是道观。但在《儒林外史》中，老道跟和尚混在一起亦非鲜见。那个摆酒庆贺的僧官家里，就是一个道人来来往往帮着忙活，还管和尚叫“师公”。

简直乱了套了。
(作者系深圳作家)



【缘木求鱼】 如果价值投资都赚不到钱，那么有人跑去打新股、炒炒新票，也不能苛责。

赌博的趣味

徐涛

人太闲了，是一件极难受的事情，尤其对中国人而言。但总干正事儿，似乎也让人难受。于是，许多游戏就被发明出来，供人们打发时间，消遣日子，比如，赌博。连孔圣人都曾经给那些“闲人”提过很好的建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乎？为之尤贤乎已！

在圣人看来，即使赌博，也是比吃饱了闲着强得多的。不知，是圣人的观点影响了国人，还是国人的偏好“感动”了夫子，总之，中国人好赌博，慢慢地似乎就成了一种“共识”。大约是不能埋怨这种“共识”带了种族偏见气味的——2006年，澳门赌场的收入超过

了拉斯维加斯，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就是一个不错的明证。

中国人参与赌博的历史漫长，殷商时期，这种游戏就出现并开始普及，但中国人禁赌的历史也不短，禁赌的措施有时还颇为严酷。比如，春秋的时候，即使太子赌博，也是要用竹板打屁股的，如果屡教不改，太子就当不成了。秦朝的时候，私下设赌，除了要打屁股，还要在脸上刻字；汉唐时候，措施也差不太多。到了宋朝，禁赌招数更狠，赌得厉害了，就很有可能被砍了脑袋。与宋相比，明朝也不逊色，为好赌者准备了“砍手”的药方。

不过，很遗憾，虽然历朝历代禁赌的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千百年来，赌博之戏却禁而不绝，打而不死，甚至竟

有发扬光大之势。这也真是让人莫可奈何的事情。或许，正是因为打压得过于厉害了，赌徒们反弹起来就更有意思的动物，你越不让他做什么，越能勾起他偏要做一做这个什么的欲望；以此表对权威的蔑视，大约确是一小部分人的出发点，但更多的，不过禁令勾起了好奇心罢了。不禁了，神秘感也就随之消失，没准儿，你催着他做，他反而敬而远之了。

具体到赌博这件事儿上，禁与不禁，还真让人纠结，共同的尺度，颇让人难以把握，因为这种游戏，很能让人上瘾，如果完全不管，估计许多人最终免不了要亲身饰演一下人间悲剧里的什么角色；如果完全禁止，似乎也无

可能——那么多前辈先贤历经万千努力都没做到的事情，现在的人干成的希望估计也不大。

如此看来，对赌博这种事儿，似乎“个案分析”、“淡化处理”就比较现实。如果真想有所作为、从根儿上治理一下，显然就要对症下药。赌博大约就是“闲极无聊”的副产品。郑和先生发明麻将牌，就是为了让水手们打发在海上行船的无聊日子。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再不让娱乐一下，估计有人就要惹是生非、管理起来，难度就颇大。因此，让人忙起来，大约就是治赌的良药。

不过，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大飞跃，有钱有闲的，大有人在；要想让这些“闲人”禁赌，估计难度实在不小，起码要给人家找出路，找些更有意义的

事情让人做。这样的事情，用心找，还是有的，比如，炒股票。

在中国炒股票，虽然也曾经很让一些正人君子斥骂过，但近些年，名声毕竟翻了身。虽然在有些人眼里终究还褪不去“赌博”的色彩，但平心而论，其技术含量显然要比“搓麻将”或者“一翻一瞪眼”高得多。但有时候，技术含量太高了，也让人受不了，如果投资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这种懒办法都赚不到钱，那么有些人跑去打新股、炒炒新票，似乎也不能过于苛责人家。

事物都有两面性。许多时候，苛责得紧了，往往让人逆反；人们一逆反，事情就不大好办。因此，在这件事儿上，似乎需要想想其他的办法。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